

理论卷 / 四川、江苏卷 / 甘肃、内蒙古卷 / 江西、云南卷

Qualitative Poverty Assessment
in Rural China:

Cases from Jiangxi and Yunnan

中国12村 贫困调查

【江西、云南卷】

中国农村贫困定性调查课题组

12
村

Qualitative Poverty Assessment
in Rural China:

Cases from Jiangxi and Yunnan

中国12村 贫困调查

【江西、云南卷】

中国农村贫困定性调查课题组

主编 张小军 谭 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 12 村贫困调查：江西、云南卷

主 编 / 张小军 谭 深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钟 敏

责任编辑 / 钟 敏

责任校对 / 崔冬梅

责任印制 / 米 扬 蔡 静 董 然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2

字 数 / 355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739 - 5

定 价 / 198.00 元 (全四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 12 村贫困调查》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毅

副 主 编 谭 深 马春华 张小军

编 委 (按照姓名拼音排序)

陈 昕 郭 虹 黄小军 金一虹

马春华 潘 杰 谭 深 王晓毅

肖唐镖 许 平 占少华 张小军

案例研究集序言

收录在这里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农村贫困定性调查”课题的案例研究部分。在这三卷案例集中包括了课题组在中国6个省12个村所做的案例研究。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已经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中国减少贫困的努力也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赞扬。但是，作为贫困者本身，他们是如何理解贫困，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在经济迅速发展、农村贫困人口日益减少的背景下，他们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呢？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研究的初衷。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一种类似快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全国选择了6个省12个村进行案例研究。我们共组成了6个研究小组，深入到农村基层，在每一个村庄进行20~30天的调查。我们通过与村民广泛接触，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对贫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

深入访谈和细致观察是我们在研究中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我们吃住在农民家里，和村庄中不同的人群聊天，观察村民之间的互动，力图对村庄的整体有一个清晰的把握。我们发现，贫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所以需要把贫困放到一个具体和整体的环境中去思考，而不是将其孤立出来，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段去加以考察。这也正是我们选择以村庄为单位进行定性研究的原因。为了还原这种以村庄为单位的整体性，我们将12个村庄的研究报告集中在这里，希望能够为相关的研究和决策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还得益于世界银行“走出贫困”课题（Moving out of Poverty: Understanding Freedom, Democracy and Growth from the

Bottom-up) 的启发。我们有选择地采用了这个课题组所使用的一些研究工具, 比如他们用来反映不同人群社会流动过程的生活阶梯 (Ladder of Life)。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工具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同样有效, 研究中我们也证明了这一点。

村庄已经是一个微观的层面, 但是村庄是由人构成的, 所以我们在每个村庄中的研究经常是以人或家庭为单位的。我们收集了大量个人或家庭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经常会采取抽象的方法, 从丰富多彩的经验世界抽象出简单的理论。这种简化的方法无疑对于把握复杂的世界是有所帮助的, 然而也是很不够的。因为这种“化繁为简”的方法在舍弃了细节以后, 也许向我们呈现出现象背后的抽象规律, 但是这种规律却离现实世界相去甚远。现实世界是多样的, 要把握现实世界也需要通过多样的细节。因此, 我们在案例研究中保留了大量原始素材, 包括农户访谈和个人生命史等, 这些资料都是原汁原味的, 都没有经过“深”加工, 没有经过抽象, 但是正是这些原汁原味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真实世界。

人们经常会质疑案例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这次调查的 6 个省及 12 个村, 没有通过随机抽样产生。首先, 我们认为不管增加多少样本, 对于全国 60 多万个村庄来说, 样本的数量都是很小的, 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甚至我们在村庄内所访问的农户也没有进行随机抽样。这不仅因为人口大量流动, 随机抽样不可能实现; 更因为我们也不认为随机抽样就具有代表性。定性研究不是要通过搜集足够多的样本以取得统计学上的代表性, 它更关注的是逻辑上的普遍性。我们之所以收集了大量村庄和农户的信息, 不仅因为这些信息能够帮我们构建一个解释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框架, 而且因为它们能够保证这个解释的逻辑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农村贫困线制定的依据是满足一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物, 中国扶贫的目标也就是解决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但是我们知道, 人是社会动物, 并不因简单地维持生存就感到满足。中国在经历了 30 年大规模的扶贫, 农村普遍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后, 贫困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而变成了社会问题, 这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一些学者倾向于用相对贫困来概括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的农村贫困问题, 但是我们避免使用这个贫困的概念, 因为我们发现在不断变化的经

济指标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稳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从社会文化角度考虑，贫困是稳定的，是绝对的，但是表现出来的收入标准却在变化。因此，单纯用收入标准并不足以反映贫困的问题，我们更关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

比如，维持家庭再生产在农民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农民必须能够结婚生子，维持家庭的延续，这是判断一个农户是否贫困的重要标准。尽管结婚成家的开支在不断增加，但是不管如何增加，其背后的社会意义是一致的。

单纯经济指标是静态的，所以会产生脱贫与返贫的循环，但是农民会从长时期来看贫困问题。比如，家庭的生命周期对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当一个家庭处于特定的阶段，消费人口增加而劳动人口减少的时候就特别容易陷入贫困；而随着家庭周期的变化，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相应改善。从这个角度说，家庭的贫困是周期性的。农民将处于周期性贫困中的家庭与无法摆脱贫困的家庭作出明确的区分；有些家庭被认为是“没治了”，而有些家庭的窘困只是暂时的。

外出务工被认为是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农民也不怀疑打工对于增加收入的意义，在许多地区，农民增加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但是农民看到了外出打工的双重性：在外打工尽管收入增加了，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收入微薄，劳动条件恶劣、工作又脏又累。许多外出打工者并没有将外出打工看做向上流动的途径，而是看做维持生存必须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对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作用是有限的。

在人口流动增加、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农民之间原有的互助互惠正在被市场交换关系所取代，农村社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正在淡化，农民对社区的关注在减弱，而社区对社区成员的支持也在减少。社区的公共资源日益萎缩：有形的资源，包括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的维护；无形的资源，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日趋瓦解。弱势的农民得不到社区的保护，其面临的各种风险在迅速增加。

因此，现在农村贫困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从案例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不同的贫困成因：因为家庭的周期变化所带来的贫困；因为遇到重大支出，如医疗、教育、经营失败等而形成的贫困。而现有的扶贫项目和社会政策对于应对目前的贫困，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由于场景不同，贫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在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进行扶贫开发的时候，贫困成为一种资源，因为抢到了贫困的帽子就意味着争取到了资源，所以出现了“唱贫”文化，地区、村庄和村民都争相叙述自己的贫困，希望自己进入被扶持的行列中；但在政策的喧嚣后面，贫困群体是被边缘化的，他们经常被社会主流所忽视，很难参与扶贫的决策，在经济发展的主流中，甚至经常成为“隐形人”。

我们尽管试图做一些总结，但是这些总结并不能代替农民自己的陈述。

在这次研究中，我们之所以选择这 12 个村，并非这些村庄具有什么典型意义，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们不具有所谓的典型意义。这些村庄彼此都存在着差异，我们甚至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哪一种类型的村庄。定性研究不关心所选样本的代表性，关心的是它们的多样性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关心它们是否有助于揭示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所掩盖的逻辑。我们选择的 6 个省，有 5 个省分布在中西部贫困地区，1 个省在经济发达地区。这样选择主要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差异性，有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异，有西南和西北的地区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不构成类型学的不同。而在村庄的选择上，我们几乎只考虑了一个因素：可进入性。我们认为，村民越容易接受我们，那么我们越可能获得真实的资料，特别是由于当时研究计划的执行有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用很多时间从零开始与村民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许多村庄入选都是因为原来在这些地方有研究基础，与村民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正是因为村庄的选择上考虑了这种可进入性，从而保障了我们的研究队伍能够迅速地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之中。

现在，我们终于将这 12 个村庄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每个村的研究成果都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应该说反映了我们每个研究小组对村庄整体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贫困的理解和解读，是经过研究者加工的；第二个部分是访谈资料、生命史等各种资料，这些资料既可以看做我们研究的原始资料，更可以看做村民自己对他们生活世界和贫困的理解和解读。正是通过这些原始的资料，那些被研究者自己浮现出来。他们不仅是被研究者，他们也是研究者。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生存状态；在我

们不断的追问下，他们自己也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所以，这些资料也可以被看做是他们自我研究的成果。我们在书中保留这些原始资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自己发出声音，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倾听。

这三卷案例研究集能够成书，我们首先要感谢那些接受我们访问和调查的村民和地方干部。他们不断地被我们打搅，无私地为我们的调查提供各种资料，从他们记忆深处调出各种回忆，即使有些回忆和讲述并不是令人感到愉快的过程，特别是对于贫困农民来说，他们的回忆和讲述往往都很沉重，但是他们无私地贡献了这一切。由于帮助我们的人太多，而且我们在行文中特别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所以我们无法在此一一感谢他们。

在调查完成以后，每个研究小组都独立地完成了研究报告的写作和资料的整理，每位参与调查和研究的成员的工作，都反映在各个研究报告和附录的各种资料中。此后，谭深、马春华和张小军对各个小组的报告和资料进行了汇总和重新整理，其中程瑶参与了四川、江苏和云南资料的编辑工作。在最后完成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钟敏编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技术建议，并做了最终的编辑加工，在此也再次表达我们课题组对钟敏编辑的感谢。

中国农村贫困定性调查课题组

2007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江 西 卷

江西水村

研究报告

消融社区中的贫困 / 3

生命史

总是渴望外出打工的留守母亲 / 41 赣南乡村走出的私营企业主 / 48 生活在农村的下岗职工 / 60 不一样的童养媳 / 80 从小就没有受过苦的木匠 / 95 从来没有种过田的年轻人 / 108

农户访谈

村干部访谈一 / 116 村干部访谈二 / 132

江西唐村

研究报告

赣江边的水库移民村 / 142

生命史

多次离职的村支书 / 166 当了五十多年村干部的老汉 / 175 偶然成为村小教师的苗佐湖 / 179 共和国的同龄人 / 185 多种角色，一样生活 / 189

云南卷

云南西村

研究报告

高寒地区的彝族村 / 197

农户访谈

读书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事 / 237 只要把魔芋种好，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 240 家里这么多人就靠我这点工资 / 242 为了生活有时要超载 / 245 种经济作物带来改变 / 247 没有家庭的支持自己做不成事 / 249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 252 我家里的困难是看病的困难 / 255

焦点组座谈

普通村民焦点组座谈 / 257 青年焦点组座谈 / 260 骨干群体焦点组座谈 / 262

云南宁村

研究报告

“整村推进”之后的多民族村落 / 284

农户访谈

从代课老师到村干部 / 315 讲公道、道德品质好，去到任何地方大家都信任 / 318 种烤烟最有益，自信心在增强 / 321 我家是村里的养殖户 / 323 小卖部生意赚了钱 / 326 担任村干部精神生活改变了很多 / 329 生活一直都是较差的 / 332

焦点组座谈

女性焦点组座谈 / 334

○ 江 西 卷

江西水村

研究报告

消融社区中的贫困^{*}

本篇研究报告是基于江西省于县吉镇水村的调查和定性研究所形成的。

水村地处江西南部山区，为革命老区，在“十五”规划中被列入江西省的重点扶贫村。这里湿润多雨，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经济作物种植较少。农村居民的收入还比较低，2005年公布的全县人均收入仅有1500多元。

由于地少人多，且靠近广东和福建，很多村民外出打工。水村占全村人口60%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都外出打工。外出打工的收入构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当地人口大量外出打工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打工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在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之前，村庄多数家庭处于贫困状态；而在此之后，大量家庭变成了中等收入家庭。尽管村民的收入有明显提高，但是因为支出的增加，农民

^{*} 本报告为“中国农村贫困定性调查”课题的分省报告之一，该项研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和资助。报告由王晓毅和马春华执笔。分课题组的负责人为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主要成员还有：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花传国（江西省委党校）和刘春春（江西省委党校）。花传国和刘春春参与了报告第一稿的写作。江西省委党校的肖唐镖、刘晓青和黄雪松也参加了调查。调查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水村村委会更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诸多的方便，调查过程中还得到许多村民和村干部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生活的脆弱性并没有降低。农民必需的支出包括建房的费用、教育和医疗费用，以及不断增加的农业生产费用。

在这个村，贫困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社区层面的贫困，第二个层面是农户层面的贫困。社区层面贫困首先体现在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村内常住人口老龄化，在村内从事农业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其次也表现为村内经济结构简单，农业收入很低。社区层面的贫困还表现为村内基础设施的落后和社区生活的萧条，村庄缺少应对各种社区问题的集体行动能力。农户层面的贫困首先体现在那些无法维持生存的家庭中。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贫困主要体现为其经济的脆弱性。尽管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但是对于多数家庭来说，他们的生存状态非常脆弱：农业收入只能维持家庭的口粮，而家庭日常支出的维持只能依靠打工收入。这样的平衡非常脆弱，一旦出现疾病、教育等意外的支出，家庭就会陷入贫困；甚至没有意外事情发生，正常家庭进入低收入的周期，也就是孩子还未成为劳动力，而又有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家庭的收入就会明显减少，从而进入村内贫困家庭的行列。

尽管来自政府的帮助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帮助对于缓解贫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保户制度是唯一对缺少劳动力家庭提供帮助的制度，每年 800 元的补助基本可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由于不再有社区的支持，五保户现在完全依赖国家的救助。对贫困农户的帮助和农村大病救济，因为补助金额很少，而且村民不知道如何申请，这些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在“整村推进”政策的实施中，村内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道路被硬化，水陂和沟渠得到整修，修建了新的灌溉设施。但是由于缺少社区的参与，这些项目尚未形成可持续的管理机制。

政府推动的经济作物种植基本上全部失败了，原因在于缺少市场的支持。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①发挥社会政策的

作用，提供对农村的直接支持。教育、卫生领域的支持可以减少农民的脆弱性，对特别困难的家庭提供有力的支持。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从事农业的多是村内比较贫困的农户，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贫困农户提供有效的支持。③在扶贫工作中，要强化民主透明的机制，增强社区参与，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社区集体行动的能力。

一 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点的选择

江西省共有 21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563 个乡，5000 个重点村，按统计口径全省贫困人口为 80.27 万人。“十五”期间，共有 1200 个村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十一五”期间规划有 1800 个村。根据实际的可进入性和我们研究的目的，课题组在扶贫县中选择了干县作为项目县。

干县位于江西省南部，是“十五”期间赣南 8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全县共有 24 个乡镇 279 个行政村，总人口 55.7 万。其中，有 14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镇、36 个重点村。

干县地形属丘陵山地，境内河流密布，几百条大小河流纵横全境，集山区、库区于一体。干县在“十五”期间，最重要的扶贫方式就是“整村推进”和“移民扶贫”。后者主要指的是对于居住在深山区、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的群众实施整体搬迁的扶贫开发方式。因此，课题组选择了位于大河流域的水村和位于库区的唐村作为这次研究的项目点。

（二）研究方法

1. 定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这次研究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定性研究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从被访者所处的具体环境和经验中理解他们是如何理解和定义贫困的，他们在面对贫困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扶贫

政策在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实施的成果如何。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农户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关键人物访谈、相关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的访问和个人生命史调查。从我们实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来看，探讨以社区为单位的贫困及与贫困相关的问题，这些方法还是相当有效的，当然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2. 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反思

(1) 调查点的可进入性和调查者的身份。在研究过程中，尽管我们特别强调我们只是学术调查，既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问题，但是调查地的政府和村民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身份。地方政府对于扶贫调查非常敏感，因为国家重点扶贫县的名字可以给他们带来大量扶贫款。与此不同，被调查的农民没有特别关注我们的身份，多数村民只是觉得很久没有官方的人（在他们眼里，我们也是官方的人）能够住在村民家里，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很真诚地接受了我们。

(2) 时间和居住地点。定性调查需要充分的时间与被调查对象进行交流。因此制定严格的调查计划，并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的选择多是在调查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形成的。定性调查是调查人员、被调查者，以及地方政府之间互动的结果。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和允许我们的调查，以及被调查者希望如何参与我们的调查，这些都决定着我们的调查方法的选择。

(3) 调查的解读和分享。在调查中，我们希望尽可能地理解农民的逻辑。我们的调查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比如，在同样的社区条件下，农民往往倾向于将贫困的原因归结到个人层面，如个人的懒惰、缺少计划性。但是我们的调查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不断地发现新的事实，形成新的解释，从而寻找农村贫困的深层原因。因为我们的调查并不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分享我们的发现，并在分享过程中，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和证伪。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讨论是最重要的工具，这不仅仅包括与被访问对象的讨论，研究小组内的讨论也很重要。

(4) 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我们在研究中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从被访者的角度来看待什么是贫困，如何摆脱贫困？但是在实地研究